

知識分子的角色與「姿勢」

● 張茂桂

自從三月總統選舉以來，知識分子和政治的關係，再度成爲社會議論的焦點。其中又以中研院李遠哲院長的社會關懷與政治干預爲最，不論是發表〈向上提升〉的公開信，上千名知識分子與文化界連署表示支持李遠哲「站到第一線、站出來」，還是最近受託組成兩岸關係的「跨黨派小組」，都引起社會很多的議論。

一些反對李遠哲表態的政治人物及學者，希望逼迫李遠哲作一個選擇，或者讓他回中研院作一個專職院長，或者激他「下來」變成專職的政治家（人物）。而李遠哲回答是學術只有獨立，沒有中立的問題，而自己則是不計名位，是「頂

天立地」，盡「知識分子」一己建言之責。

事實上，關於「知識分子」的角色與義務，是否要保持所謂「中立」、要如何關心並參與社會公衆事務，甚至有人說知識分子有一種「十字架、天責」，應該對國家社會有責任等等，代表一種特定的「應然」立場的討論，並不是一種現象的分析。我們的確應該嘗試回顧這些不同論述，並且檢討不同論述形成背後的社會脈絡條件。

知識分子之爲「士」

第一種論述，認爲「知識分子」是有道德情操的知識人，用知識

李遠哲的表態，引發了不同的意見。



與道德責任來引導社會，正如同中國古代的「士」。所謂「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以天下為己任」，應該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責任感。歷史上固有一些特立獨行之「士」，

如司馬遷、范仲淹、顧炎武、王陽明等等，他們「有所為有所不為」，「可殺不可辱」，「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等等，成為後世所樂道之「知識分子」典範。不過，這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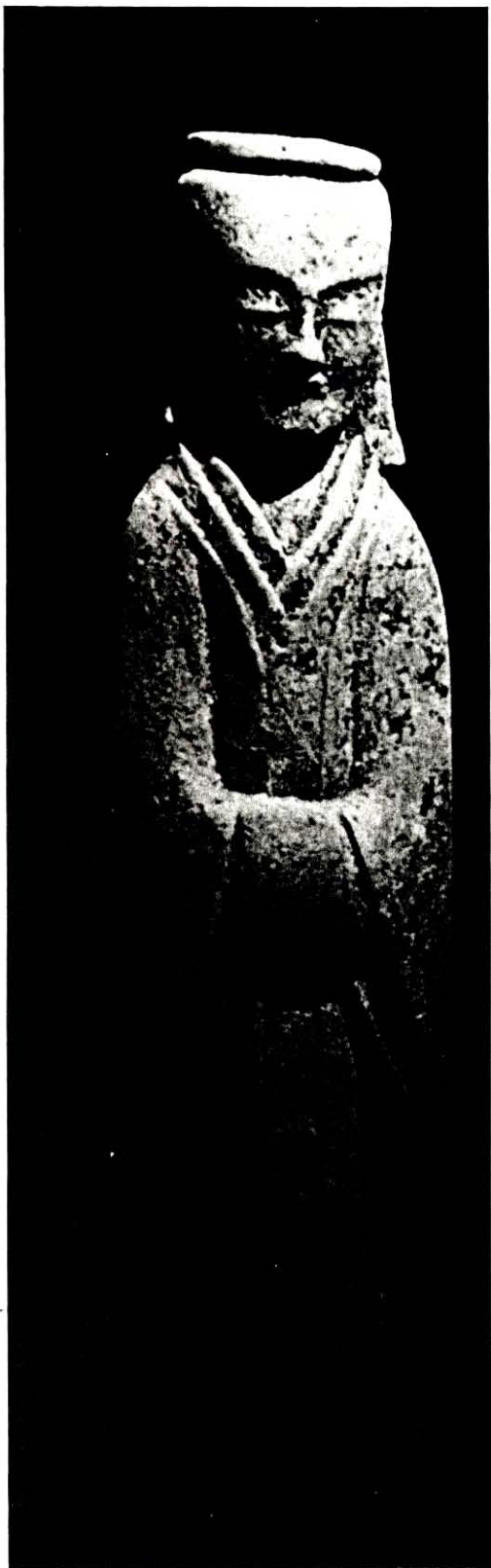
論述和兩千年來大多的「士」的基本作為型態，並不符合。

「士」興起於春秋戰國時代，原來是一群試圖用知識取得權力與社會地位自創的社會階級。「士」之所以能夠興起，和當時列國競爭霸權，各國君王謀建立有效的統御與富強之術，有絕對的關連。「士」幾乎必定為帝王或公子貴族所養、所用，或者承擔官職（所謂「學而優則仕」），附庸在封建統治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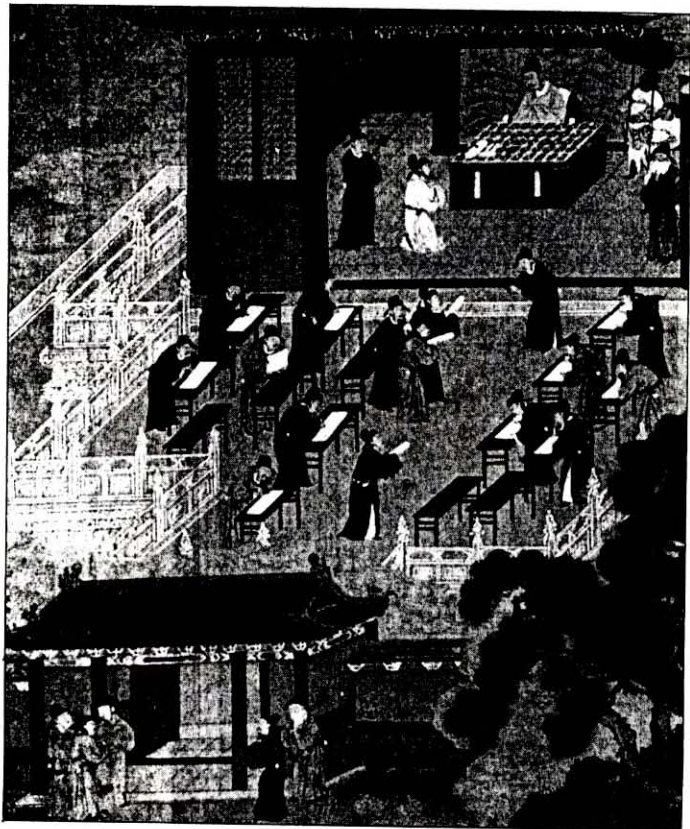
級中的權力結構之中。否則，士人階級又有何辦法「以天下為己任」？

但是「士」有自我要求的道德責任，這讓「士」和平民、王公貴族得以區分。因為有知識與道德責任，所以能夠以菁英的身份來領導平民（故謂「民可使由之」），作為百姓之模範，「值得」受到平民百姓之尊敬；「士」又因為強調道德對於政治的重要，所以，可以扮演規勸君王權力的身份，是統治者

「士」興起於春秋戰國時代。



漢唐以後，科舉盛行，讀書獵取功名，方為正途。



的必備；士藉由將「政治」道德化的途徑，得以鞏固自己在社會與權力階級上的位置這是古代「士」作為一種社會階級的特色。

漢唐之後，科舉盛行，讀書獲取功名，是為正途。「士」不是沒

有具抱負與責任感，但是「士」正確的說已經是讀聖賢書的「儒生」既圖為君王所用，權力來自對於朝廷之效忠，又如何能維持特立獨行呢？所以兩千多年來，其中或者會出現傑出之典範，因為和當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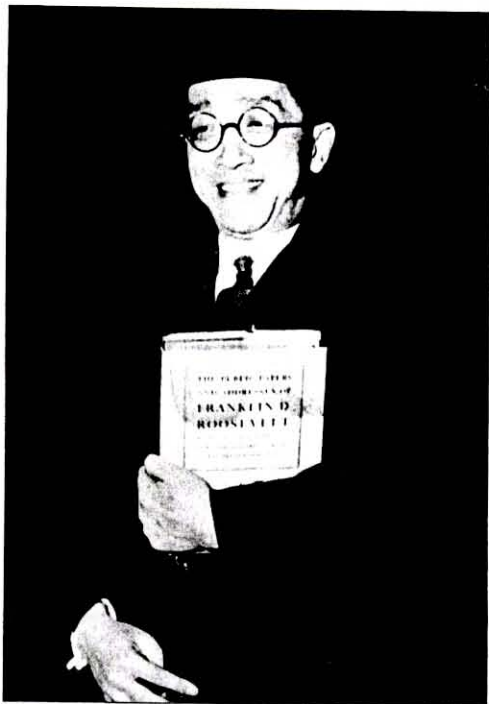
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創始人陳獨秀努力打倒傳統的「士大夫思想」。



不合，寧受罷黜；但是大部分的「士」，或後來的「儒生」，「事實上」，是一個靠道德知識與效忠帝王，提供君王統治所需之知識與意識形態基礎而維生的特殊官僚與利益階級，即使可能有反抗，大多是辭官「歸隱山林」（所謂「用行舍藏」），或者興辦私人學校。「士」沒有參與不參與政治的問題，「仕途」幾乎是正常而必然的選擇。

新知識分子之「天責」

「士」之所以成為二十世紀以



自由主義者胡適（上）及
蔣廷黻主張以西化改革國故。

來「知識分子」的典範，其實是近代的新發明。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在西方文明衝擊，列強入侵，以及共和革命發生的脈絡下，透過「自省」或者「被喚醒」的覺悟，於是重新界定傳統的「士」、「儒生」。新知識分子一方面保留了「士」的責任與道德抱負，但另一方面則嘗試去除「士」的封建特性。「效忠帝王」與「報效朝廷」為新的政治語言如「國家、民族」，「人民、社會」所取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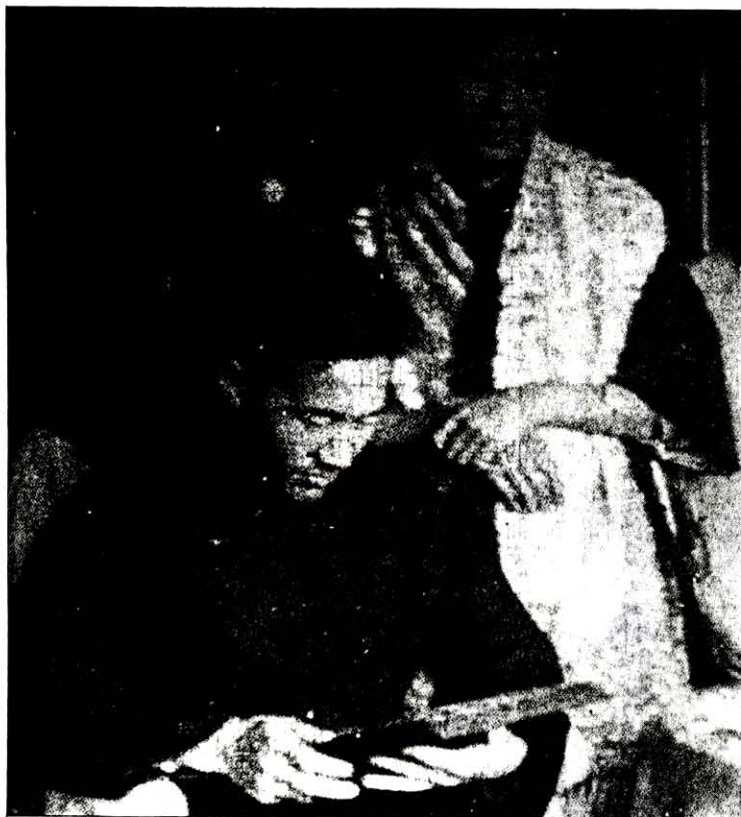
當代所有「知識分子」的「使命感」（所謂「十字架」、「天責」），愛國家、愛民族的澎湃熱血，以及為社會服務、造福人群等等，事實上都是二十世紀以來的一種「新」的自我認知，要救國救民，追求國家民族之獨立與富強。而「知識分子」之所以不成「士」，只是假托「士」之氣節，最重要的差異在於新時代的知識分子基於革新的必要而主張西化並對「國故」進行大檢討。傳統的「士大夫思想」，根本認為是等同「封建保守」，是新知識分子要打倒的對象。不論

是左傾者如陳獨秀，或者自由主義者如胡適、蔣廷黻等都屬於這一類。劇變中國的知識分子，利用各種不同的方式介入政治活動與社會文化運動，知識分子和社會大眾一起「掙權」，反對軍閥與帝國主義，後來左傾知識分子加入反對法西斯獨裁運動，不但沒有所謂「不應過問政治」的問題，反而組織（或者參加）不同的政治團體（一種新式的、進步的社會動員形式）、讀書會，加入「喚醒」民衆的行列，並視之為是一條大道。

而「反帝國主義」也在一九二〇年後成爲重要的知識分子胸襟，台灣更是如此。好比在東京留學的台灣「新青年」與台灣醫生蔣渭水等。因爲新社會的物質基礎的轉變，言論大開與出版資本主義在都市成形的結果，新的傳播工具像報紙、雜誌、電影誕生。日本對華侵略以及在台灣的殖民，都激發了新一

代知識分子的興起。一種新的身份地位，靠書寫但不做官的獨立「文人」，像記者、作家、詩人、散文家、導演與劇作家，更複雜了傳統對於知識分子的界定。「文人」知識分子作爲一種「識域」的拓展者，一種用文字進行「啓蒙」的社會工作者，像胡適、魯迅、老舍、郁達夫，回台灣推動白話文的張我軍

台灣醫生蔣渭水表現「反帝」的知識分子心胸。



五四「啓蒙」的社會工作者：如魯迅（左）、老舍（中）、郁達夫（右）。



當代

還有新文學的賴和、楊逵等等。此一時期的顯著知識分子，幾乎多為廣泛的「政治與文化評論人物」。但隨即威權當道，知識分子對於政治的熱情投入與發表議論，造成統治者的麻煩。在台灣，日本時代有「六三法」，後有「二二八」與「白色恐怖」，在中國大陸，有「反右」、「文化大革命」的全民運動，一些和當道不合，或者不為當道所喜歡的知識分子，因此受到相當大的傷害。

整體來說，在國族建構、革命劇變與殖民地人民要求解放的時代，「知識分子」是否可以參加政治，或者爭奪政治權力？從來沒有應該不應該的問題，只有「正當與不正當」，或者，政治立場對不對的問題。而我們現在強調的「知識分子」專業，所謂「學者專家」，在當時並不是重點，不但「專業主義」還未發生，而支持「專業主義」的社會條件，也還在萌芽之中。

知識分子之為「專家學者」

當代另外一種知識分子論述，



回台灣推動白話文的張我軍。

台灣新文學工作者賴和（上）和楊逵（下）。



楊逵可稱之為普羅文學作家。





台灣戒嚴時期
知識分子如殷海光，
備受迫害。



當年行政院長孫運璿以
「國建會」名義，邀請國內外
知識分子建言。

或可稱為號稱中立、不應介入政治，而只是扮演諮商者角色的「學者專家」論述。「學者專家」論述興起於一九六〇年代後期，也就是台灣的威權統治與經濟起飛時代；在這個時代，一方面國家繼續壓抑獨立知識分子，嚴控公共事務的參與或討論空間，啓蒙、敢於直言的「知識分子」的處境，其實是困難的，好像殷海光、胡秋原的遭遇。但另外一方面國家又加速追求經濟現代化，需要知識與實用技術的投入。因此，一種單方面強調政治中立的專業知識工作者，所謂客觀中立

的「學者專家」，正好滿足這樣的需求。比如稍早的農復會的「洋務派」，到蔣經國時代的經建會，以及蔣經國、孫運璿以「國家建設會議」所邀集國內外知識分子進行大規模的建言活動等等，都讓「專家學者」之名不逕而走。當然，很多「專家學者」也都自認為是有責任的「知識分子」，不過，此時的「專家學者」親近權力的熱望甚熾，以「為國家做事」為名，卻希望為威權者所拔舉，和古代靠知識能力替君王服務，獲得君王青睞的「士」、「用行舍藏」的處境，倒是非

常類似。

造成「專家學者」論述大興的另外一個物質條件，是資本主義對於知識生產資源的掌控，以及經濟活動對於知識生產分化的作用。晚近工業生產需要知識生產的突破，而知識生產所需要的各種投資與撥款，也越來越大，知識生產的內容，也越來越取決於知識生產的「經濟效果」。即便不是取決於單純的「經濟效果」，也會受到知識的「意識形態」與「政治效果」（如和歷史、文學、語言、民族有關的研究）的影響。一旦認為能帶來大的

「效果」，自然容易受到撥款的支持，一旦認為「不能產生什麼效果」，研究就不易受到鼓勵發展。

如果說二〇世紀中以前的知識分子還有強烈的責任感，作社會啓蒙的抱負與期待，晚近的「學者專家」的特色，則在於默默地為投資財團、政治體系服務效力，扮演單純的「智庫」、「諮商者」、「評估專家」的角色。過去的「知識分子」論述，要求能同時試圖掌控知識生產內容與目的，並且高度的關注知識的實踐，如同具有「經世致用」的目的，但是當代的「學者專家」，缺乏改革的實踐性，「默從」的成為體系的一員螺絲釘。客觀中立的「學者專家」只管掌控知識生產的過程部分，至於知識生產的「目的」，或者知識內容的「實踐」，並不在乎，反而交給知識工業的投資者、委託研究者去決定。這些投資者——經常是私人財團、各種政治經濟力量組合而成的基金會，或者國家高等教育與科學研發機構——可以透過研究獎勵與人才培育的投資，直接或者間接的強力影響「學者專家」的知識生產內容與

維生方式。

將知識分子比喻為「士」、「專家學者」，或者要求「知識分子」有特別的責任感、十字架，各有其時空脈絡與物質條件。各種關於知識分子「應該」如何的論述，是和知識分子要如何介入政治領域，選擇用什麼特別的立場與「姿勢」，介入政治有關。我們也不應該忘記，在專業主義掛帥的社會裡，政治也形成一種專業。議員、官僚、黨工，自有一套「認證制度」（如符合「選罷法」的規定並通過選民考驗）的支撐。「專業」原來就代表一種權力獨佔，當知識分子在繼續拓展領域的時刻，和專業政治者的衝突，也會越來越激烈。

因此，我們與其說李遠哲違背了知識分子的角色，好像有一種特定的知識分子規範受到挑戰，不如說，李遠哲所選擇的介入的「姿勢」，像他對於陳水扁的支持，讓很多人感覺不快與感覺權力受到剝奪，因此他們一改過去對於李遠哲的敬重，反而要使用「學者專家」相關的論述，「糾正」越界的「知識分子」。反過來說，一些支持李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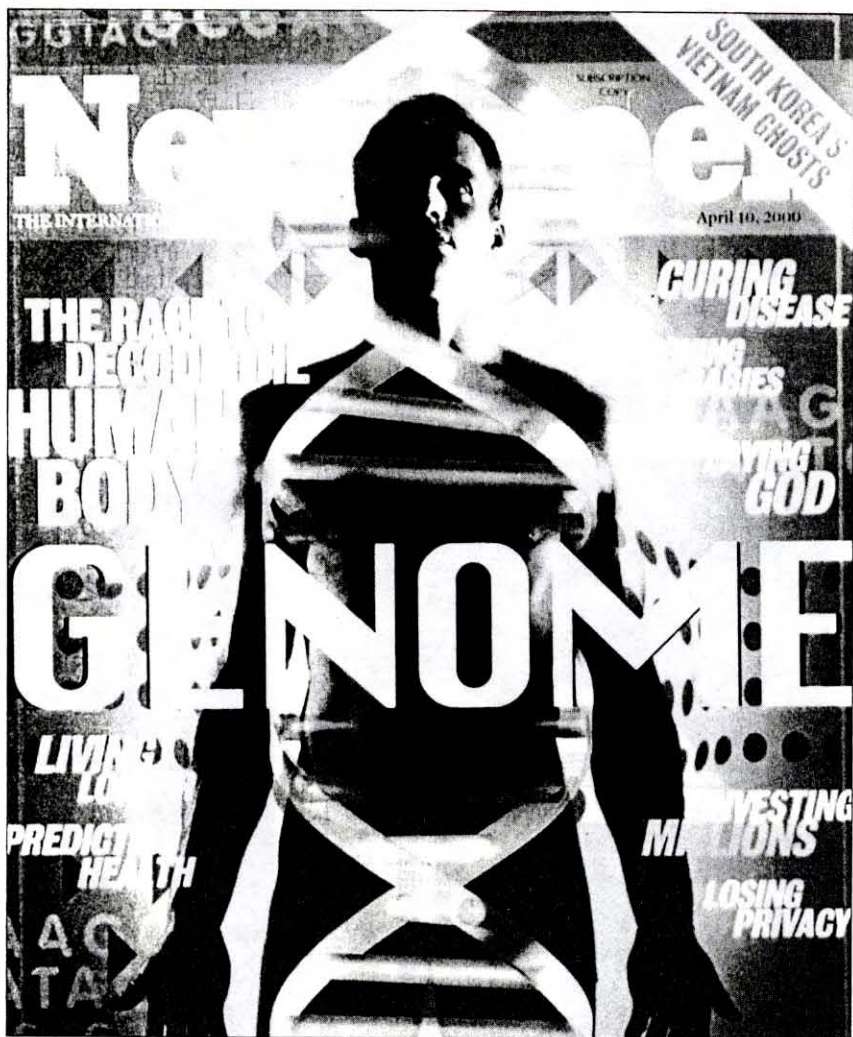
哲的辯者，與其說李遠哲實踐了某種知識分子的責任，也不如說李遠哲的「姿勢」，讓其他有類似抱負的得到鼓舞，並預期能因為李遠哲介入所可能產生的「效果」，獲得更大的發言力量，甚或實際的權力。

知識分子之「姿勢」

我們如果還在辯論知識分子是否應該問政、參政、從政，或者討論知識分子的固有角色而不論時空脈絡的特殊性，坦白說，既無必要也無營養。任何知識分子都是公民，不管問政、參政、從政，應該都是允許的，我們誤以為知識分子的參政與問政，一定得有「專業研究」上的權威，那就錯誤。而我們也必須認識，像李遠哲這樣，一方面身為台灣重要科技領導者，原來就必須爭取、管理各種學術研究的投資（諸如人才基金、預算經費、未來研究方向等等問題），原來就必須面對各政治經濟利益的介入企圖，也原來就無從逃避政治專業者、資本利益團體的「跨界」、「監管」。他本人在過去扮演的比較屬於

是體系內的「學者專家」角色，故不會擋人之路，至今李遠哲也還偶爾會這樣自我論辯。但是，自從去年以來，他其實上已經朝向問政、影響政治走向的「知識分子」身份靠近，也直接「跨界」侵入了原本屬於政治專業權力所壟斷的權力範疇，這是所有關於李遠哲「該不該」這樣或那樣的問題的基本癥結。

二十一世紀知識的跨國界來源，越來越複雜。一方面知識生產越來越為商業集團與少數國家所壟斷。高科技、生物科技已經成為強大的支配力量，並且和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形成互相的壟斷與共生關係。美國政府、財團與科學家正史無前例努力為全世界人類與生物起源解謎，一個是生物基因的團隊研究，另一個是太空的探索。預期各種「大發現」所能帶來的政治經濟（包括戰略）利益，難以想像，但必定將帶領美國繼續成為二十一世紀的世界霸權。另一方面，資訊與知識，透過國際網路也越來越普及。一些獨立知識分子透過普及的全球化連結，不但沒有消失，反而取得全球性的重要。好比西蒙·波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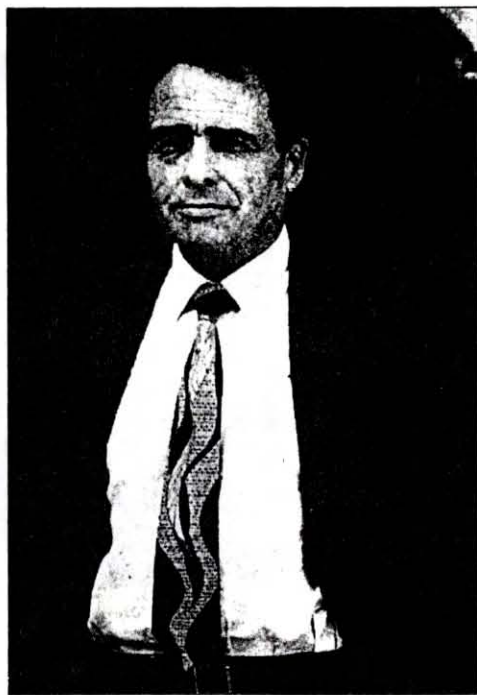


二十一世紀的最大生物科技的進展就是基因研究上的突破。

Simone de Beauvoir)，杭士基
(Noam Chomsky)，薩依德
(Edward Said)，霍爾 (Stuart
Hall)，波笛爾 (Pierre Bour-

diva) 等，他們對於當代的「知識領域」的開拓，早超出了區域、語言與國族的界線，也遠遠超過了我們對於知識分子的想像：所謂「士」的、「學者專家」的以及「國家民族責任感」的。

今後我們討論的「知識分子」，所剩下的，大多只是一種特殊的「姿勢」，一種問政的方式與態度，而不是一套固定的倫理價值。「知識分子」，身為「識域」的拓展者，必須進行邊緣突破，而不是重複既有的論述／科學。「知識分子」，掌握知識生產內容，對於自己生產的內容有認同感，而不是疏離異化的關係。「知識分子」，覺察知識生產的目的性、工具性問題，因此是有責任的知識生產人。「知識分子」選擇介入公共事務，但是因為是「業餘」者，所以更可能獨立思考，反省利益與權力的偏見。正因為可以「獨立思考」，所以可以對有勢力者說出「我不同意」的真心想法。知識分子的「姿勢」，用簡單幾個字來說，大概就是「邊緣突破」、「知識生產責任」、「業餘問政」與「獨立思考」。



西蒙·波娃(上右)、波笛爾(右)、薩依德(上左)、霍爾(中左)、杭士基(下左)對當代「領域」的開拓，已超越區域、語言與國界了。

